

#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

田 仲 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

田 仲 济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3023

开本 850×1168公厘 1/32·印张 4 3/4·插页 5·字数 101,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统一书号: 10099·781

定 价: (6) 0.85 元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11篇文艺論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十月革命对我國現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对我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意义，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第二部分，論述了魯迅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及对資产階級右派的斗争，并分析了冰心、郁达夫、王統照等作家的思想与作品；第三部分是对資产階級唯心主义的批判。

論述均較深刻，观点明确，可供文艺工作者、爱好者研究参考。

## 目 录

|                                          |     |
|------------------------------------------|-----|
| 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催生滋育了中国现代文学 .....               | 1   |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社会主义<br>现实主义发展的意义 ..... | 11  |
|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 .....                         | 26  |
| 鲁迅，战斗的旗帜！ .....                          | 36  |
| 鲁迅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发展 .....                      | 41  |
| 鲁迅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                       | 60  |
| 冰心的思想和创作 .....                           | 73  |
| 郁达夫的创作道路 .....                           | 93  |
| 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                       | 109 |
| 为什么要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br>和方法 .....         | 128 |
| 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学术上的毒害 .....                   | 142 |

## 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 催生滋育了中国现代文学

### —

我們常說，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是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但这只能說是問題的一面，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不能說明含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自鴉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积弱，逐渐淪于半殖民地的地位，經常受到帝国主义的侵侮，当时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努力向西方学习，找寻救中国的方法，介紹进来的自然是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学說，卢梭、孟德斯鳩等就是在那一时期輸入进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学說和本来的封建主义思想自然是不相容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自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不相容的，所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运动是反帝和反封建的，秋瑾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血可以說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流的，林覺民的一字一泪的“絕笔書”，代表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民主主义者的决心。

自鴉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强烈地反映了这种思

想。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实际是“射英”的隱語；朱伯韓、魏默深、貝青喬、張維屏等反映鴉片戰爭的詩歌，达到憤慨怒罵的程度，写出了“羣衆英勇，官吏畏葸”。民衆是“犂鋤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斕”，官吏是“黎庶脂膏軍士血，染成丹頂位三台”，到一旦强邻压頂，又“仓皇官尽挂冠行”了。反映中日戰爭的文学比鴉片戰爭更多更情緒激昂，陳惕菴、杜德輿、李光汧、張羅澄、吳昌言、袁祖志、鄒增佑等，激烈地攻击了清廷上下的昏庸，“不能及早防范，只知私人享乐”，“元戎甘割地，上将竟投戈，向來无一策，富貴只求和”。他們贊美战死的英雄和抗敌的人民，对于刘永福孤守台南，終于牺牲，吊詩很多。黃遵宪在他的詩歌中更表現了詩人热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刻划出了侵略者的凶恶残暴，諷刺了权貴的顛覆无能，歌颂了人民爱国志士的勇敢抗爭，壮烈牺牲。

在小說方面，夢花居士的“蜃樓外史”，又觀我齋主人的“罌粟花”，彭養鷗的“黑籍冤魂”，吳趼人的“黑籍冤魂”短篇，反映了鴉片問題。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吳趼人的“恨海”，憂患余生的“鄰女語”等，反映了庚子事變。

仅就列举出的这些作者和作品的名字已足够强有力地証明这一个时期的文学是具有浓重的反对清朝封建統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內容。比这更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性質更彻底些，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所以称为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迈进的文学或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的文学，絕不能仅由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上來說明。

五四时期以前的文学所以不能称为含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因素，主要的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不足，而是由于它们所肯定所歌颂的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的政治、社会思想和制度。虽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主张冲决“利禄的罗网”、“考据词章的罗网”、“全球羣学的罗网”、“君主的罗网”、“伦常的罗网”<sup>①</sup>但他们所向往所歌颂的是欧美资本主义那样的民主和科学技术，是维新后的日本的社会。所以对封建制度的摧毁，主张是彻底和激烈的，想代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制度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由当时在士大夫阶级中占主要势力的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洋务运动和社会上的一些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运动，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进步的知識分子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怀疑和幻灭。什么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呢？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说：

“……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在鲁迅的眼中，这就是辛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所以在“狂人日记”，在“祝福”，在“离婚”等小说中显示出来的仍然是阴森可怕的封建势力，——吃人的社会。但鲁迅的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狂人日记”、“药”、“明天”等等，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初显示出的实绩却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不是仅仅在形式上，而是在实质上，鲁迅的作品同前此的作品有所不同。在这一时期，不止一次，鲁迅提到了“生活”问题；也不止

一次，魯迅提到了人生的“路”的問題。對於“生活”，他主張年長的“開辟新路”，“解放幼者”，“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sup>②</sup>對於“路”，他主張“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sup>③</sup>

魯迅在他的著作里忿怒地否定了吃人的封建社會，也同樣忿怒地否定了具有濃重殘余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統治勢力的充滿了“飢荒、苛稅、兵、匪、官、紳”等等災難的他所處的現社會。魯迅在日本多年，熟知日本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若是他所向往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話，他必然會將“生活”，將“路”作進一步地明確地解釋的。很顯然的，魯迅既毫不懷疑地否定了封建制度，也同樣的毫不屬意於他所熟悉的資本主義制度。他所向往的是還未十分了然的，還未進入生活過的“生活”，還未進入走出來的“路”。因而，這“生活”，這“路”，在魯迅思想中是還非常模糊和朦朧的。只能抽象地籠統地說它是“幸福”的、“合理”的、前人還未走過的，比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更好的生活道路。

魯迅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狂人日記”等作品所以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初顯示出來的實績，應當說主要的原因都在這一點上。五四時期中國的文學所以是具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因素的原因也在這裡，這是它超過批判現實主義的地方，也是它和前此文學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魯迅的作品超越了批判現實主義，且進而具有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想因素，但魯迅的這種思想因素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在又過了十六年以後魯迅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

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創造者是无产階級，但因为資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④由于魯迅不但“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而且“待十月革命后”，知道了“新的社会的創造者是无产階級”，所以他在作品中更彻底地否定了旧的，而热切地将希望寄托在超越資本主义制度的新的未来上。又因为魯迅对于新的社会究竟不晓得它的具体的好坏，再加以帝国主义的反宣传，因而有些“冷淡”和“怀疑”，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他的作品的思想模糊和朦朧。

由批判现实主义的中國近代文学到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的中國现代文学的过程，雄辯地說明了中國现代文学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孕育和滋养下誕生的。魯迅在“呐喊”序言中的話更証明了这一点，他說他的創作是为“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又說，“既然是呐喊，則当然須听将令的了”。这“猛士”，这“将”，当然是指当时“新青年”杂志的編輯，新文化运动的領導人李大釗或他的战友，那就是說馬克思主义的“猛士”或“将”。在馬克思主义的“猛士”的伴随下，在馬克思主义的“将令”下进行創作，这就是魯迅作品所以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的原因。

## 二

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左翼十年”的无产階級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國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大的发展。最早提出无产階級文化及无产階級文学的是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維埃文学培育成长的中国左翼作家蔣光慈，他以蔣俠僧的笔名于

1923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那是中国最早的阐明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首先他指出了无产阶级是爱护文化、发展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化开一条新途径。”接着他提出文化的阶级性：

“……因为社会中有阶级的差别，文化亦随之而含有阶级性。统治的阶级为着制服被统治阶级，于是利用文化迷惑被统治阶级之耳目，而别一方面被统治阶级生活于劳苦之中，几无享受文化之机会。不错，文化为全人类的结晶，但因阶级斗争的原故，文化本身不得不蒙着一重阶级色彩了。”

随后，蒋光慈并谈到了由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到全人类文化的过程：“……阶级既归消灭，文化的阶级性亦随之而失去，全人类的文化方有开始发展之可能。虽然无产阶级革命一时不能造成全人类的新文化（因为阶级一时不能消灭），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却开辟了创造人类的新文化之一条途径。”最后，他又指出了资产阶级垄断文化的原因以及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生，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一大势力，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就必然地创造出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执政后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

蒋光慈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全面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显然的，设若不是吸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文学的滋养，蒋光慈是不可能在那时提出较比全面的革命文化——文学的理论的。蒋光慈不但提出了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了最早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革命诗集“新梦”。他的诗主要内容是歌颂十月

革命，歌頌列寧。

這以後不久，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被介紹了進來。1930年在中国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下，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綱領中正式宣布，“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獻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鬥爭”，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這實際上是接受並貫徹了列寧的文學的党性原則，進一步將無產階級文學作為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把革命文學放在革命的領導下而為革命服務。

在左翼十年中對新月派買辦資產階級文藝的批判，對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的抨擊，對虛偽的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揭露，魯迅、瞿秋白都運用和闡發了列寧的文學的党性原則。馬列主義文藝思想武裝了我們的頭腦，使我們和反動文藝思想鬥爭中都獲得了徹底的勝利。

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一樣，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產生，並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乳汁滋養下生長壯大起來的。也就是因為這樣，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是為中國革命服務的，是屬於中國革命的，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就更加強了這種關係了。依靠了這種關係，中國現代文學獲得了較強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依靠了這種關係，在解放前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革命文學一直在發展着。雖然中國大部分土地被反動派盤據着，但在文藝陣地上，革命文學始終佔着壓倒的優勢，國民黨反動派的槍殺、活埋、查封、封閉等，沒發生絲毫的作用。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任何歷史時期，絕大多數的作家，尤其是擁有讀者羣的作家，都是革命作家或是受革命思想領導的作家，這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史上的

一个特点。中国现实主义的大师，共产主义思想的战士，鲁迅，是革命文学运动的领导人和为革命而贡献了毕生力量的典范。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大量地介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作品，他认为翻译无产阶级名著，尤其是苏联的名著，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给中国读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他称苏联文学是暗夜的火，他比喻介绍苏联文学好象普洛米修士替人类盗来天火。因此，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统治下，杀头查禁的威胁下，卢那卡夫斯基、梅林格、普列汉诺夫等的文艺理论，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等等都陆续被翻译了进来。接着，“士敏土”、“十月”、“第四十一”、“夏伯阳”、“一周间”、“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马”、“保卫察里津”、“城与年”、“苦难的历程”……都成了中国读者最欢迎的作品，而高尔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等，都成了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名字。这些作家和作品影响和滋养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男女，培养出了中国无数的青年革命战士和作家。

### 三

苏联文学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入和普遍，以至今今天若是想谈苏联文学给我们以及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极困难的事情。我们走到极偏僻的山村里会遇见人批评他的伙伴有些戈尔洛夫，我们在任何一条街道上可以遇见衬衣左襟上绣着保尔班、海鷗班的青年或红领巾。今天我们人民作家中没受过苏联文学作品的教育的，可说是没有的。远从中国大革

命前后的一代青年起，凡是喜爱文学的就没有一个不喜爱苏联文学的，他們常常为了耽讀文学而接近了革命，这些青年有的已成了今天重要的革命工作者，有的已成了人民作家。在革命战争中，苏联的軍事小說更成了我們絕大的鼓舞力量，不仅因为他們創造了感人的伟大的英雄形象，并且通过这些感人的艺术形象，在軍事思想上，治軍观点上，政治教育上給我們以重大的启示。几乎許多的这类小說成了我們部队中的軍事教科書。如考涅楚克的“前綫”、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皮加別夫的“士兵兼統帥”、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軍”、特別是別克的“恐惧与无畏”，是战士和指揮員們所百讀不厌的。苏联作家的名字在部队中成为非常熟悉和敬爱的名字，他們作品中的主人翁，欧格涅夫、沙布洛夫、潘非洛夫、巴武尔庫、萊奋生、保尔、达維多夫、密烈西叶夫都深深地印入每个人的心中，成为鼓舞工作和战斗的楷模。

这已是长时期以来的普遍的情况，如全国战斗英雄张明，他曾讀过“恐惧与无畏”、“鉄流”、“对馬”、“旅順口”、“夏伯阳”等百余冊小說，其中有的如“鋼鉄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等，都讀过三遍到四遍，他亲身体会到这些書对他帮助的巨大，不仅从其中学到了軍事科学知識，并且找到了自己所学习的榜样。在艰苦战斗的环境中，他經常以苏联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鼓舞和激励他的战斗伙伴。自己每当遇到最困难和最危险的情况，就不禁想起党，想起保尔、沙布罗夫等英雄的形象，随着也就会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仅仅这些事实已說明苏联文学如何培育了中国現代文学的成长，也培育了中国青年們的革命行动，鼓舞和教育了中国人民

的战士。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孕育长大起来的苏维埃文学，是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成长壮大，中国革命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是完全分割不开的。的确，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维埃文学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的里程碑。中国属于人民的作家没受过苏联文学的教育的是没有的。就是直到今天，苏维埃文学仍然是我们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和楷模。

1957年11月5日

- 
- ① 譚嗣同：“仁学”。
  - ②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③ “故乡”。
  - ④ “答国际文学社问”。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以来即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迈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为艺术家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以及发展中的现实实践所丰富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①因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性和贯穿在作品的艺术经纬中的一种倾向，即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②比起过去的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形式，都是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一个新质的”历史阶段。这是由共产主义的思想性，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孕育出来的现实主义。但无可否认的，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家大多数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而如何“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也就是如何在文学创作上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在“为羣

众与如何为羣众的問題”解决以前，是无法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鲁迅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那个时期，“为羣众与如何为羣众”的問題仍然沒有解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基本上也还是在萌芽的状态。”<sup>③</sup>1942年延安文艺座談会的召开，实际上是在过去革命文艺的基础上来解决一直未能解决的“为羣众与如何为羣众”的問題，这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木問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从理論上解决了這個問題，把“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可以說“假如說‘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說是繼‘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sup>④</sup>的理由，“毛澤东同志正确地提出文艺必須为工农兵服务，这就关涉到作家的整个人生觀、他們本身思想感情的改造問題。而这就恰是一切問題的关键。毛澤东同志就从这个根本关键上解决了文艺与广大人民結合的任务，这是‘五四’以来所一直企图解决而沒有能够解决的任务。”<sup>⑤</sup>

## 二

每次讀到“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輒不禁使我們想起“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列宁在这篇經典理論著作中树立了文学的党性原則，澄清了当时对文学艺术的一些混乱的看法，特别是揭发了“純艺术”理論——艺术的超階級的理論的虛偽性，指出了在階級社会中，“在劳动羣众作乞丐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虫

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戴着伪善的假面具的）对于錢袋的依赖、对于收买的依赖、对于豢养的依赖。”从而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文学家们无党派性的文学理论的党派性的本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是很相同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苏联文学发展中的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根据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结合中国当时具体情况，针对着长期以来文艺上一直未能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而提出的，并且进而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列宁指出了“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一般讲来，它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充实了这一原则，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更阐述这主张说，“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这更确切地说明了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文学艺术的党派性质。文学艺术不属于无产阶级，就必然属于资产阶级。今天属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文学艺术，既不可能是属于别的阶级所有，也不可能由别的阶级来领导。在这里，不仅接触到了文学艺术的“为群众”的问题，也接触到了“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因为